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七十八期（总第 328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9 年 11 月 15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年前，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经济“寒潮”席卷全球，中国经济增速骤然下滑，为应对危机，2008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推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财政、货币政策并肩发起“冲锋”，阻击中国经济下滑。一年后，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的明显趋势，前 3 个季度增长达到 7.7%，全年“保八”已无悬念。回眸惊心动魄一年间，“一揽子计划”是如何牵引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进、企稳回升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哪些新挑战？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走？值此“一揽子计划”一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聆听专家的声音，开阔视野，奋然前行。

本刊特此推出《“一揽子计划”的回眸与展望》专题，“延伸阅读”栏目推荐“黄靖：中国发展模式的未来”一文，推荐理由是它不仅与本专题前后呼应，还因为它的思想深刻，且具前瞻性。刊后附有调查表，也请各位领导于百忙之中对本刊提出宝贵意见。

要目

●本期专题/“一揽子计划”回眸与展望

国务院推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

“一揽子计划”跨越一周年 推动中国经济 V 型反转

西方国家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不是我国退出依据

经济刺激计划仍需加强

中国经济谨慎步入后危机时代

吴敬琏：GDP 增长要“悠着点”别再上了

孔泾源：中国经济 2015 年前或将出现“五大转变”

●延伸阅读

黄靖：中国发展模式的未来

●本期专题/“一揽子计划”回眸与展望

国务院推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

回眸惊心动魄一年间，“一揽子计划”是如何牵引中国经济巨轮破浪前进、企稳回升的？“保八”目标无悬念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哪些新挑战？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盘点和展望。

4万亿投资“保增长”，如何“调结构”再成焦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近日宣布，我国前三季度GDP增长率达到7.7%。权威专家表示，我国实现全年GDP增长8%的目标已无悬念。

政策回放 2008年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我国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两年内投资4万亿元以刺激经济。随后，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应对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点评 4万亿巨额投资计划宣布时，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还不明朗。一年后再看，当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及时而果断，彰显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预见能力。“保增长”目标实现后，“调结构、扩内需、惠民生”将显得更加迫切，能源资源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急需加快推进。同时，巨额政府投资之后，如何确保民间投资跟进，进一步释放中小企业活力，打牢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依然是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课题。

货币政策“放水养鱼”，密切监管“通胀预期”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期在出席中国创业板首批公司挂牌上市仪式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政策回放 2008年11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我国的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2009年10月14日，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前三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29.31%，增幅比上年末高11.49个百分点；新增贷款总额共计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天量信贷”前所未有。点评与当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比，此次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力度更大，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更强烈。“天量信贷”已促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但同时通胀预期有所抬头。过剩的流动性引发人们对明年物价上涨的担忧。另一方面，如何确

保巨额信贷流入实体经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也考验政府宏观调控策略，影响今后货币政策走向。

十大产业触底回暖，“产能过剩”亟待化解

10月20日，一辆解放牌重型卡车驶下中国一汽集团的生产线，这标志着我国继美、日之后成为第三个年产千万辆的汽车生产大国。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30%，年销量有望超过1200万辆。

政策回放 2009年1月14日，汽车和钢铁两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公布。之后，我国装备制造、纺织、船舶、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有色金属、物流等产业振兴规划相继公布。至2月25日，国务院圈定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全部出台。

点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及随后出台的细则，是我国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和消费，对实现“保增长”目标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但投资拉动易，结构调整难，我国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沉疴”不仅没有在“调整”中缓解，反而在“振兴”中进一步加剧，如钢铁产业，目前粗钢产能过剩上亿吨。值得深思的是，在走出此次危机中被寄予厚望的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新能源产业，竟然也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在“去库存化”后真正实现“去产能化”，事关经济复苏大局。

区域规划争相出台，防止新一轮“GDP竞赛”

随着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各地掀起了将地区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编制热潮。我国区域发展雏形基本形成，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增长极。

政策回放今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此后几个月里，国务院相继批准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十多个区域振兴规划……

点评如果说提振实体经济有一个政策坐标，那么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是“纵轴”，而区域振兴规划则是“横轴”。从实践看，获批的区域正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重要“支点”。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指出：“要防止地区间的盲目攀比，大多数情况都不能搞特殊的政策优惠。”不能忘记前些年各地搞“GDP竞赛”、重增长轻民生的教训。

节能减排初见成效，“低碳经济”考验中国

11月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表示，我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非常有希望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一度步履艰难的节能减排工作初见成效。

政策回放去年 4 万亿投资计划启动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决不能动摇，行动决不能松懈。”

高耗能行业投资比重明显下降，小火电关停任务超额完成，减排目标明确具体，扶持发展新能源产业……2009 年 9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时承诺，中国到 2020 年将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点评应对危机一年来，一系列节能减排举措助推“调结构”取得新进展，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国大力推进的节能减排和当前国际上倡导的“低碳经济”异曲同工，但因为起步晚，我国环保技术和相关产业发展滞后。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加快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和政策部署，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发展制高点。

“扩内需”成效明显，经济转型任重道远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加快，需求结构明显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在近期研究部署第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一方面肯定应对危机的成效，另一方面也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政策回放今年初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政策措施：1 月 1 日起实行增值税转型，减轻企业负担 1200 亿元。此后几个月，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等刺激农村需求的措施相继出台。进入下半年，国家又推出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地方政府也推出“消费券”等扩大内需措施……

点评与投资、出口相比，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短板”。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 10 个百分点。此次应对危机中的一系列“扩内需”举措，弥补了因出口骤降损失的部分经济增长份额。但在“保增长”的压力下，我国要实现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任务仍十分艰巨。而经济复苏最终要靠消费来支撑，当务之急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加大困难群体的救助力度，让更多居民“敢消费、能消费”。

“惠民生”筑基固本，分配不公难题待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近日表示，前三季度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 851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 94%，截至 9 月 1 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 74%，高于去年同期……

政策回放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等标准；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比例……一年间，政府“一揽子计划”中处处可见“惠民生”的身影。温家宝总理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透露，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上年增长29.4%。

点评“民者，国之根也。”从大力推行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到提高城乡居民社保水平，从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到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政府为解决民生难题而做的努力有目共睹。值得警惕的是，社会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人们期待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大解决“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民生改革力度，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一揽子计划”跨越一周年 推动中国经济V型反转

针对特定过热行业 政策会采取逐步微调方式退出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出口遭遇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这也为中国调整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最优比例和最佳作用提供了一个契机。”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兼中国证券和大宗商品主席李晶(Jing Ulrich)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指出，金融危机后期，中国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重点集中于社保及消费方面,致力对偏重于投资及出口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她预计，中国的内需消费会在中国未来的经济架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比重。

中国经济面临新机遇

李晶认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她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了过去的金融市场秩序，也给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此消彼涨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国是最大也是最为亮眼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全球发达国家所聚焦和期待的开放发展中的重要金融资本市场。

“中国是金融危机一个潜在的受益者。”她认为，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金融市场最发达、信用扩张工具运用最多的市场。与欧美市场相比,中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要小得多。现时，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已经显示出良好的进展。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从一季度的6.1%上升至8.9%，工业生产增长也从年头的3.8%回升到9月的13.9%。

尽管提升信心及稳定市场的目的已经初步解决，但李晶也指出，尽管中国经济率先于其他经济体触底反弹，但目前谈经济刺激措施“退出”，还言之过早，实体经济的反弹后劲需要时间观察。现时经济复苏的动力大部分来自投资（前三季度贡献95%的GDP增长），产能过剩问题未能得以解决，就业率及生产附加值较低的问题继续限制居民收入增长,拖累结构性调整的步伐。

“经济转型是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最重要而漫长的一环。但短期内淘汰落后产能和附加值低的工业企业必然会对经济起负面影响。”李晶认为，在私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之前，国家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刺激措施。货币政策仍要坚持适度宽松的取向，保持银行体系有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确保经济增长的势头。

她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央行加息还需要一段时间。未来 12 个月内，产能过剩和失业率的问题会使通胀率会保持在 3% 左右。政策退出会采取逐步微调的方式及首先针对特定增长过热的行业。

未来关注三大趋势

李晶还认为这一次金融危机给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她还提出了以下三方面将是未来几年值得关注的三个主要趋势。

首先，上海发展成为主要的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她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到 2020 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制造基地。尽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仍坚持推行金融改革，在过去几个月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同时，上海市政府也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批准外国公司在上交所上市。

其次，人民币逐渐走向国际化。李晶认为，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担心美国的“定量宽松”政策将导致通胀率上升和美元贬值，因此正在调整债券到期日并将资金转出机构债券，同时增持期限为一年或以内的短期债券。“总体而言，尽管其储备增长有所放缓，但仍继续买入国债。在逐渐降低储备投资组合的信贷风险的同时，中国对商品的投资也逐渐增加。”此外，中国也正积极促进人民币在作为区域贸易结算货币方面的作用。

与此同时，她认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此前呼吁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提议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建议拓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创造一种新的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储备货币。在有关 SDR 的提议中，其中一项是建议扩大 SDR 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采用以实际资产（例如储备资金）支持的发行方式。目前在外汇储备最具规模的 IMF 成员国中，只有日元被纳入 SDR 篮子货币。“可以推断，中国正热切期盼人民币成为 SDR 定价的篮子货币之一，进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李晶指出，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不是一步完成，而是先区域化，逐渐全球化。

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加快。李晶指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坚定了“走出去”的步伐。部分中国企业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一契机，已经开始走到国际收购兼并的前沿，开始转变为跨国公司。现在来看并购已经成为主流。

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发达国家流动性短缺，其不仅波及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还开始波及它们的实体经济。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约束，首当其冲的是中小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防止资金链断裂，这些企业急需通过股权转让解决资金问题。这正好与中国企业投资需求形成互补，中国企业手里有资金，但缺少技术、品牌和市场，通过股权投资，参股或购买世界一流企业，可以使中国企业有机会分享其技术品牌和市场带来的利益，也可以从中学到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的东西。（证券日报 侯捷宁 2009 年 11 月 07 日）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

西方国家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不是我国退出依据

对于国家采取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总结表示，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情况来看，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有效地解决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有效地通过扩大内需解决了出口受到重挫的问题。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第二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8% 应该没有问题。

他说，今后一揽子刺激计划还需要继续推进，不过要注意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使我国的经济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强的竞争力。这主要体现在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要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也就是调整经济结构；二是产业的升级换代的问题，要通过鼓励新技术、新产品、新能源的开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近期以来，大家对“通胀预期渐强”存在很多担忧。对此，赵锡军表示，通胀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经常性问题，这并不是经济危机带来的。就是在 2007 年危机还没发生的时候，通胀也是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经济政策本身就是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经济不要过热两者之间的保持平衡。所以通胀不可怕，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解决、化解这个问题。调整产业结构，防止局部过热，就是应对某些领域过热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已经到了退出的时机，当前有诸多争论，赵锡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还不是退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适度宽松的政策是不会退出，也不能退出的，对于它的一些负面影响，应该从调整结构方面下功夫。因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促进经济增长还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所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不过从经济均衡发展角度来讲，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某些领域发展过快、过猛、过热，

在这些领域里面，确实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发展速度还是有待进一步加强的，这些领域还是需要经济政策来刺激、促进它的发展。

虽然，目前有一些西方国家在采取一些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措施，但这不是我们国家也需要退出的依据。因为西方国家的社保等等都发展非常完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他们提出退出是合理的。而我国，人均 GDP 才 3000 美元，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得加紧发展才行，如果不施行行之有效的刺激，那么要赶他们的程度就会遥遥无期。所以我们要实行积极的政策，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

最后，他表示，从目前来讲，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调要继续保持，在此基础上，进行有保有压的结构调整，让经济发展建立在结构均衡的基础上。（《证券日报》夏青）

渣打银行等企业行业研究员

一揽子计划撬动铁路、工程机械、汽车等行业不断“攀高”

渣打银行近日发布最新的全球聚焦研究报告，在大规模持续，至今看似成功的政策刺激之下，全球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经济需要复苏来为全球经济的信心和信心恢复作出贡献，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的复苏并不令人信服。

在中国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一周年之际，业内专家指出：“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主题投资在固定资产方面，包括铁路、工程机械等，受益影响比较大，抑制休克性下跌显效果。经济回升中靠投资增加大，弥补出口下降对 GDP 的影响，经济增长保八没有悬念。”

2008 年 11 月 5 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党中央、国务院于出台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包括四万亿的巨大投资计划出台后，紧接着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宏源证券交通运输、水泥行业研究员王哲说：“从 GDP 来看，投资拉动效果明显，一些铁路建设定单已经排到了后年，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铁二局等公司定单都较多，拉动当地需求和就业。”据摩通报告，指内地新铁路订单增长势头持续，第三季金额达 1410 亿人民币，按年升 19%，按季增 40%。

王哲还说：“今年启动内需，汽车行业也特别好，公司股价上涨，家电下乡后家电业也销售形势好转。”9 月，汽车总计销售 133.2 万辆，同比增长 77.2%。前三季度汽车总计销售 964.4 万辆，同比增长 33.6%，已超过 2008 年全年销量，细分车型中，微客、微卡、轿车表现较好。”

2009 年三季度业绩显著提升的大行业是汽车、钢铁、煤炭、电力、电子、航运。海通证券常规驱动因子的分析结果显示，汽车受盈利能力提升驱动，煤炭受规模驱动，钢铁电力航

运电子受双因子驱动。对驱动因子后续研判是中下游高净利率或不可维系；利润率有从中游转向上游的趋势；国内需求仍有规模效应。

海通证券对主要行业的后续判断是，钢铁、煤炭、电力的规模驱动效应还将延续，而钢铁、煤炭存在涨价动力将改善行业盈利质量，但这将压制电力航行业的盈利质量；依靠盈利质量提升行业业绩的造纸、船舶、汽车在未来面临成本上涨压力，盈利质量优势恐难延续；航运因为计提冲回的财务处理因素改善航运业绩，不可延续。

但有关专家表示，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取得一些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隐忧，在国务院近期印发的一份通知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六大行业被确定为调控和引导的重点。电解铝、造船、大豆压榨等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的行业也被点名，这在振兴规划的十大产业中也存在。

专家指出：“现在，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四万亿投资有一项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跟上，但目前 40%-50% 的资金不到位；希望把明年投资带起来，但整体上看比大家预期的弱。”（证券时报 马玉荣）

经济刺激计划仍需加强

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年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下复杂的发展环境，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怎样的蜕变？

应“战”： 踏出前进步伐

源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急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大海啸，成为笼罩全球经济最大的乌云。此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低估了这场风暴的威力，飓风般的肆虐让世界各国如临大敌。

中国经济也未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外需和内需的同步向下调整，导致经济增速失重下滑。面对复杂变化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政策也在迅速调整，其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密度之高，历史罕见。

2008 年 11 月 5 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发出保增长的强有力信号。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到 2010 年底，安排 4 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国一揽子投资计划大幕就此拉开。

回首一揽子计划出台一年间，从 2008 年 11 月 5 日到 2009 年 11 月中国经济触底反弹，梳理这期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可以清晰地看到：党中央、国务院面对经济生活面临的复杂局面，精确把握中国经济自身发展阶段和规律，科学远眺“国计民生”的大是、大势，运筹帷

幄，沉着应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果断地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部署，使中国继续踏出稳健的前进步伐。

鏖“战”：保持政策连续性

“四万亿”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心剂”。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重点投向有7个方面，包括：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灾后恢复重建。

财政、货币政策“冲锋”阻击中国经济下滑。2008年年初时，财政政策从“稳健”到“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年中时，财政、货币政策取向不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3日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和充实完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和相关政策措施。

年底时，保持财政、货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今年后几个月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十大产业规划发动中国经济“引擎”。2009年1、2月份，国务院相继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工业、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产业和物流业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相关统计显示，除物流业外，其它九大产业工业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80%，占中国GDP总额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

目前，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已出台60多项实施细则。这些措施扩大了国内消费、稳定了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了产业技术进步，规划的贯彻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果。

新“局”：经济增速逐季加快

去年四季度中央及时果断实施一揽子计划，希望的种子经历了春天的发芽、夏天的成长，终于迎来了秋天的收获。从2009年一季度GDP6.1%的近年来谷底，到二季度7.9%，再到三季度8.9%，中国经济增速划出一道有力的“上行线”——中国在向世界宣布，已经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保增长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中国经济增速呈现‘V’形反转之势，这是中央果断出台一揽子计划取得的明显成效。

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在这么严重的打击下，一年来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调，除了中国自身支持经济发展的条件非常好之外，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尽管回升向好的趋势得到巩固，但也有专家警示，中国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困难，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仍然不能松懈，经济刺激计划仍需进一步完善。

4 万亿投资“保增长”

2008 年 11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我国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两年内投资 4 万亿元以刺激经济。随后，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应对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点评：4 万亿巨额投资计划宣布时，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还不明朗。一年后再看，当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及时而果断，彰显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预见能力。“保增长”目标实现后，“调结构、扩内需、惠民生”将显得更加迫切，能源资源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急需加快推进。同时，巨额政府投资之后，如何确保民间投资跟进，进一步释放中小企业活力，打牢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依然是经济增长必须面对的课题。

货币政策“放水养鱼”

2008 年 11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我国的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2009 年 10 月 14 日，央行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前三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 29.31%，增幅比上年末高 11.49 个百分点；新增贷款总额共计 8.67 万亿元，同比多增 5.19 万亿元，“天量信贷”前所未有。

点评：与当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比，此次采取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力度更大，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更强烈。“天量信贷”已促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但同时通胀预期有所抬头。过剩的流动性引发人们对明年物价上涨的担忧。另一方面，如何确保巨额信贷流入实体经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也考验政府宏观调控策略，影响今后货币政策走向。

十大产业触底回暖

2009 年 1 月 14 日，汽车和钢铁两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公布。之后，我国装备制造、纺织、船舶、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有色金属、物流等产业振兴规划相继公布。至 2 月 25 日，国务院圈定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全部出台。

点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以及随后出台的细则，是我国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的投资和消费，对实现“保增长”目标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但投资拉动易，结构调整难，我国一些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沉疴”不仅没有在“调整”中缓解，

反而在“振兴”中进一步加剧，如钢铁产业，目前粗钢产能过剩上亿吨。值得深思的是，在走出此次危机中被寄予厚望的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新能源产业，竟然也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在“去库存化”后真正实现“去产能化”，事关经济复苏大局。

区域规划争相出台

随着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各地掀起了将地区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编制热潮。我国区域发展雏形基本形成，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增长极。

今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此后几个月里，国务院相继批准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等十多个区域振兴规划.....

点评：如果说提振实体经济有一个政策坐标，那么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是“纵轴”，而区域振兴规划则是“横轴”。从实践看，获批的区域正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重要“支点”。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栋生指出：“要防止地区间的盲目攀比，大多数情况都不能搞特殊的政策优惠。”不能忘记前些年各地搞“GDP竞赛”、重增长轻民生的教训。

节能减排初见成效

去年4万亿投资计划启动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决不能动摇，行动决不能松懈。”

高耗能行业投资比重明显下降，小火电关停任务超额完成，减排目标明确具体，扶持发展新能源产业.....2009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时承诺，中国到2020年将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点评：应对危机一年来，一系列节能减排举措助推“调结构”取得新进展，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国大力推进的节能减排和当前国际上倡导的“低碳经济”异曲同工，但因为起步晚，我国环保技术和相关产业发展滞后。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加快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和政策部署，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发展制高点。

“扩内需”成效明显

今年初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政策措施：1月1日起实行增值税转型，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此后几个月，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等刺激农村需求的措施相继出台。进入下半年，国家又推出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地方政府也推出“消费券”等扩大内需措施.....

点评：与投资、出口相比，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的“短板”。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此次应对危机中的一系

列“扩内需”举措，弥补了因出口骤降损失的部分经济增长份额。但在“保增长”的压力下，我国要实现从“投资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任务仍十分艰巨。（证券时报 包兴安）

中国经济谨慎步入后危机时代

逐步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的中国经济，虽然正收获一年前启动的 4 万亿投资计划带来的红利，但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步入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迈出的每一步都谨慎而又坚定。

反危机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周年高峰论坛”5 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后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主题，对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走势、发展路向等热点问题发表看法，为中国经济如何踏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言献策。

2008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中国将采取十大措施，在未来两年内投资 4 万亿元人民币以刺激经济。

一年后再看，当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及时而果断，彰显中国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预见能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论坛上指出，明年经济发展总体上讲是谨慎乐观的，因为有一系列比较积极的因素，市场促进的内需增长力量可能要加强，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速会有所回落，但是幅度不太大，仍然会保持一个适当快速发展态势。

出口年底的时候可能会‘转正’，明年可能会争取 8%到 10%的增长。”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总体讲已经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阶段，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他说，这个潜力要有效、持续地释放出来，需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具体来讲就需要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和谐发展。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全球经济基本上在年中结束衰退，从第三季度开始新一轮上升周期，“中国因素成为这次危机提早结束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我的分析是，明年的 GDP 增长应该会出现两位数。当然，我们要有节制地维持持续高增长，因为后年还要增长，大后年还要增长。”他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2008 年中国开始启动促进增长措施的时候，同时启动了 16 项科技专项，“我们希望在专项启动的过程中探寻到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科技基础，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有效果了”。11 月 3 日，温家宝对首都科技界发表了题为《让科技引领可持续发展》的讲话。温家宝说，谁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繁荣。

温家宝在讲话中重点提到了新能源，传感网、物联网技术，微电子和光电子，生命科学以及空间、海洋和地球科学等 5 个新兴战略性产业。

筹备达 10 年之久的中国版纳斯达克——创业板上月 30 日正式开市。“就其支持科技发展，特别是支持科技产业化而言意义重大，”李扬表示，“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事情在这时候推出，体现了我们要为中国未来的增长提供牢固的科技基础的努力。”

要看到中国经济在保增长上取得了根本性的成果。我们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让整个经济企稳回升来之不易，我们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把这种发展的势头保持下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中国已经取得了保增长的决定性成果，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调结构上来。

李扬则提出，中国的投资要以创造就业为第一要务，投资要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区域的均衡发展，融资结构要调整以便与投资结构相吻合，要完善中国投资主体结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谈上真正的复苏。

现在应该不失时机地争取尽快推出把资源税费往上调整方案，”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税费普遍上调后会促使整个产业链的生产者和产品使用者更加珍惜资源，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降耗的产品、工艺和技术，并改变大众的消费方式，这对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认为，只有扩大开放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开放市场不是迫于外部的压力，而是出于自己的发展需要。他指出，下一步的市场开放，服务业、垄断行业是市场开放的重点；不仅要开放投资市场，还要开放进口市场和户外贸易市场。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在“保八”已无悬念的情况下，下一步要更加注重经济回升的质量，政府投资不要继续大铺新的摊子，把工作重心放在进一步激活民间消费和投资方面，切实将经济回升动力切换到自主性增长上来。

他说，2010 年要全力推进增长动力切换，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2010 年财政支出在继续完成已经开工的公共投资项目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地促进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

他建议允许民间资金以适当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大力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草根”金融企业。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改革。在铁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与社会发展领域引入竞争，尽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2009-11-6 新华网 刘欢 王悦欣 牛琪）

吴敬琏：GDP 增长要“悠着点” 别再上了

经济学家对于 GDP 数据的热情或许永远淡于政客。

上周末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15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迈克尔·斯宾塞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同吴敬琏、李稻葵、余永定等国内顶尖学者齐聚一堂，就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等议题进行探讨。

这些大名鼎鼎的学者对于 GDP 数字并不感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更是直言道：“我希望中国 GDP 增长能悠着点，不要再上了。”许小年称读不懂 GDP。

吴敬琏指出，中国目前对宏观经济的分析过分注重短期政策，但这些短期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归根到底应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吴老表示，短期内需求的增长完全是靠银行贷款和政府投资拉动的，这种做法不可持续。在他看来，中国必须以振兴产业的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将附加值较低的产业升级为高附加值的产业，在研发和营销服务这两个供应链前后端高附加值的部分下工夫，实现产业的升级和振兴。

一直宣称中国经济将在明年年中二次探底的经济学家许小年甚至称“官方 GDP 数据我也读不懂”，他表示，前三季度全国 GDP 增速同比增长 7.7%，但放眼全国各地，低于 7.7% 的省市只有三个，与此同时 18 个省市 GDP 增幅高达两位数，这样的数字缺乏合理解释。

“烧钱”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决策者下定决心在短期内拉动 GDP，但这种短期内的拉动会给经济带来巨大成本，”许小年说。他预计，随着超宽松货币政策的“不应持续”与“无法持续”，大规模“烧钱”必将给银行体系带来灾难性后果，三五年后银行系统恐怕将面临几万亿的坏账问题，因为前期上马的项目没有经过仔细论证，或者得不到收益将导致资金得不到回收。

而海外经济学家对于 GDP 数字同样有很多犀利观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GDP 并不是很好的衡量市场活动、或者社会福利进步的指标，它存在一定的误导性。”他强调，只有当数据有不同的来源进行相互验证时才更为可靠，比如贸易数据因同时有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相对应所以被认为是更可靠的，他指出要找到不同来源之间相关数据的规律性，同时由独立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往往可以保护数据不受到外界干涉。

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未来可能进入一段非常长期的低增长时期，这是因为美国目前劳动力市场非常疲软，几乎六分之一的人口还无法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他表示经济目前的增长是因为有了政策的刺激，而一旦政策效应撤出，经济就将遭遇麻烦。

“中国调结构力度不如美国”

在众学者看来，经历过危机后全球经济已很难再回到过去，较之于 GDP 增长多少，无论是在海外还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才是更至关重要的命题。而无论是对经济调整的重视度、还是政策支持度方面，专家指出中国同美国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许小年对眼下美国经济的评价是——“美国经济已经基本到底了，但是结构调整还没有到位”。相比之下，中国虽然看上去比较“舒服”，但中国经济还没有经历结构调整就已被政府一手“拖了回去”，打了“吗啡”，但“吗啡”的药效不可能永远存在。

许小年指出，中国必须有效拉动民间投资，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开一部分的经济管制，放开政府垄断行业的准入。“现在的情况是，凡是民间能投资的地方都是产能过剩，产能不过剩的地方民间投资又进不去，”他说，“这场危机把经济模式转型的问题提前了。”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预言，中国或在明年上半年出台较为灵活的、新颖的收缩性政策以应对全球流动性过剩。他指出“新颖的收缩性政策”除了直接回收流动性外，同时还包括扩大金融资产供给，比如扩大 IPO 规模、推出创业板、扩大在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国债券的规模。

李稻葵指出，在香港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阻挡热钱”的作用，目前发行的 60 亿太少，至少应该发行 2100 亿到 3500 亿。同时他指出可以鼓励大型国企如宝钢、首钢、中国移动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2009-11-3 中财网 每日经济新闻 马骏骏）

孔涇源：中国经济 2015 年前或将出现“五大转变”

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涇源 5 日在论坛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是深刻的，甚至是长期的。可以预料，外需持续扩张、外贸迅速增长、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局面未来将不复存在。经过长期发展和此轮金融危机的洗礼，最迟在“十二五”期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发生质态变化或出现质态变化趋势。

涇源将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质态变化归结为“五大转变”，即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由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由外向粗放型增长向内需集约型发展转变，由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变，由贫弱国家型向大国地位型转变。

面对发展阶段的质态变化，孔涇源提出需要“七个适应”来加快推进相应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这七项适应分别为：适应消费转型升级，加快住房、交通、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体制改革；适应公共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着力推进科教文卫事业、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适应集约型经济发展，深化要素市场化和资源品价格改

革；适应城市化加速发展要求，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建设城乡统筹的基础性福利制度；适应市民社会的形成，加快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及努力推进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为避免中等发达陷阱，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适应大国地位的形成，基于全球战略谋划资源利用、配置及国家安全制度创新。（2009-11-6《经济参考报》）

● 延伸阅读

黄靖：中国发展模式的未来

编者按

所谓一个年代的定义，似乎都是那个年代的休止，而非开始。经历了数十年所谓的后现代化，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预测至今影响深远——20年前，这位日裔美籍学者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说，历史已经走到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战胜了所有的对手，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将最终统治整个世界。“福山主义”最念念不忘的，是把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巨人，纳入西方世界的版图。

但走过20年，“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似乎变得更加专制独裁；实施渐进改革，坚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正慢慢确立其独有的“中国模式”。从本世纪初“中国模式”概念兴起以来，学界的讨论此起彼伏、著述汗牛充栋。在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下，新一波“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更为引人瞩目。就此，本期对话栏目邀请黄靖教授发表自己的看法。

黄靖教授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去年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黄靖教授祖籍山东，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目前，他也担任新华社资深国际经济分析师以及中国国际与战略基金会的顾问。

中国模式受到根本性挑战

《南风窗》：经历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似乎相比起其他国家，其损失来得要小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靖：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但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而认为中国这次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也是不确切的。

首先，中国的发展模式目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直白来说，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其实是借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或者称东亚模式——通过对外开放，靠吸引外部投

资、扩大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是东亚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两个必要的外部条件。就中国而言，对外出口虽然占 GDP 比例不大，但外资的不断涌入和与外贸相关产业的发展，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外资投入锐减，而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核心，就是要保护和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即便经济复苏也未必能解决目前保护主义兴起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看来还是成功的。但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现在还很难判断。所以，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第二，中国累积了很多外汇储备。原本几十年发展经济而积累的财富，如今却变成别人绑架自己的工具。这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危险度很高，更容易受到自己很难掌控的外部变化的威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潜在损失。

第三，目前的经济危机延缓了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比如，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落后，经济结构也不合理，投资推动所占 GDP 的比例过大，而且一直不断提高。2001 年，这个比例突破 35%，2007 年是 55.6%，去年高达 57.3%。

投资比例过大至少造成两个严重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其次是就业市场和就业层次长期停滞不前。虽然年均增长率高达 9%，但中国的“实质就业市场”（Meaningful Job Market）发展十分缓慢，有社会保障和发展前途的就业机会增长不到 1%，实际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千百万农民工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大学生学非所用、“低质量”就业十分普遍。更重要的是，相当一代人的就业生涯不会有提高，可能从 17 岁到 47 岁都是做同样的低技能工作，工作技能没有提高，更谈不上更新换代。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到经济发达阶段的根本衡量指标是第三产业、即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后的 20 多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将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提高到 45%~50%以上。中国经过 30 年，比例现在才勉强达到 40%。而中国第二产业一直比重过大，目前仍然高达 50%。两高一低（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它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

《南风窗》：按照您的说法，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很脆弱的，那何来人们一直议论这个模式的优越性呢？

黄靖：虽然中国模式的弱点和硬伤都很明显，但整个中国经济实体还是很强大的。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提供了巨大机会。实体经济的抗压性比较大，恢复的基础强、速度快。

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最关键的优势，恰恰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而有力，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保留对这些产业的垄断和控制，是一种发展的阻碍和桎梏。但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控制局面的优势。

《南风窗》：危机过去，这个优势会不会又是桎梏，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即使在应对危机方面，人们对这个优势也不是没有疑虑，比如说对民生和就业重视不够，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黄靖：是的。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颇符合目前部分人士的一些主张。如维持社会公平正义；加大国家对分配的干预，保证弱势群体不被过分剥夺；保证强势团体不对资源作过多掠夺等等。这种主张类似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欧洲的各种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力并不强。他们通常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时期得势，经济一旦转衰则通常是保守党上台。

如果说，国家干预对目前的民生和就业等问题并没有显著效果，其实这反映的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仅仅靠国家行政干预来保证正义、公平和正当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国家干预本身的正当性就很难保证。新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国家对经济的大力干预，但过于理想化的建议执行起来容易走火入魔，往往形成灾难。这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

因此，经历金融危机后，对于是否要保持甚至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我本人持否定的观点。现在要做的，恰恰是要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否则，危机过后，强力的国家干预将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不利因素，将造成致命影响。我们知道，推动经济的两个动力是竞争和创新。竞争的公平、合理、透明，是激励发明创新的基础。然而，垄断经营不仅大大破坏了这两个动力，而且必然导致分配不公平、以至社会的不公平。最近民众对中石油用低廉的价格团购房屋反应强烈，表明垄断经营不仅导致了巨额利润，而且已经开始造成了社会的不公。

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现象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例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今年来解决了近 70% 的就业问题，而这与他们获得国家银行贷款的比例是极其不匹配的。

“中国模式”的瓶颈

《南风窗》：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您对“北京共识”有何看法？

黄靖：我们要和其他模式相比才能得出结论。与“华盛顿共识”比较，“北京共识”的三个基本点是：第一，集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为了整体利益可以损害甚至牺牲个人权利，所谓主权高于人权，就是这个道理；第二，是在这个理念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经济的自由，但国家有垄断经营的权力；第三，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共产党的一党领导。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来说是先经济后政治。人类社会有两个终极追求目标：繁荣与自由，能同时取得两种目标当然很棒。但问题是，如果不能同时达到两个，只能取其一，我们如何选择？有东亚与拉美两种不同模式。现在证明首先发展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拉美模式基本是不成功的。我认为，如果一个政治模式不能带给人类社会繁荣，就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到底能否从经济繁荣走向民主自由？我对此持乐观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和所谓东方、西方文明的区别无关——所谓“亚洲价值”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实现经济现代化是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现代化给人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不可逆转的好处。

首先，是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在工业化之前，人的经济独立性很差，只能依赖集体和大家庭才能生活下去，中外概莫能外。但经济现代化后，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过一份自己的日子，获得了经济的独立性。

第二，给了人最大的社会能动性。经济现代化把人类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脚下（土地）转移到了头上（大脑）。一个人只要学到知识技能，就能移动，从而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个人的经济独立性和经济资源的可携带性，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人们不愿意再将自己的权利和意志依附于所谓集体利益和权力，而是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参与。所以，经济的现代化必定导致政治的现代化。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走向民主政治制度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政治自由度、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中国的政治转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改良的，而不应该是“革命”性质的。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参与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的主体都是无产阶级，那就如马克思所说，“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但当社会主体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首要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资产不受侵犯，比如一座房子两台车；然后是平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其政治参与就大不一样。尽管很坚决，但绝不激进，而是渐进的、改良的。因为在最终意义上，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安定团结。有些东西争取不到也不会硬拼，因为他们懂得完全剥夺别人的权利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不被剥夺的权利。在长期的讨价还价状态下，最终就达到目的。这就是成熟民主制度几百年来变迁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实际也正在变。

《南风窗》：一个改良的社会是不立不破，而非不破不立。那么，具体来说，中国模式需要“立”的最重要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扩大民主？

黄靖：首先要看到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瓶颈是分配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首要目标是创造财富——“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了这一代领导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分配问题，以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分配不均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平，进而导致不公正和不正义，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比如现在富人开车把普通老百姓撞死，会导致如此之大的社会不满。原因并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人们对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中国的发展模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突破，未来的路会很难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转型，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

因为，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新的政治制度，但分配财富必定需要新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所有革命都是为了解决分配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说，中国目前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瓶颈阶段。因为现在迫切要解决的是分配问题，因此必定要触及并改动制度，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的担子要重得多。

那么，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实现民主转型呢？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多讨论。但我认为必须先把其中的具体条件厘清。真正的、理性的问题应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能够完成民主转型？比如，增加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公民社会的发展，减少政府对经济、舆论、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行政控制，等等。只要具体地谈，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已经在发生，而且是在政府主导下开始的，有些还十分糟糕。如果只谈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而不谈条件，要么是无答案，要么就是革命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上世纪 80 和 90 年代，当今中国的各种政治行动包括局部的“骚乱”的主要驱动力，已经不是诸如“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而更多的是现实的利益。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是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要分清楚，到底要把民主当成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谈，还是一种政治制度谈。作为政治制度，民主就是在制度上为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政治事务中，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妥协机制。

当人们为理想而参与政治时，革命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为某个主义和理想而奋斗，追求的是完美，这必然产生超强的排他性，特别容易走极端，互相之间的斗争也必然是你死我活。

而当人们懂得为利益而要求参与政治之时，便是民主制度发端之日。追求利益者，决不放弃，但也懂得妥协的必要。中产阶级都是过去所说的革命的“骑墙派”甚至是“两面派”，但它们却是通过渐进改良推进民主制度转型的社会基础。

执政者其实可以衡量，若不让人们为利益而参与政治，其实便是迫使人民为理想而奋斗。到底要选择哪一个，答案其实很清楚。现在《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电视剧大行其道，其实表现的都是社会中人们对理想憧憬和追求开始上升。这实际上很可能是中国目前的安定团结局面下所隐藏的真正政治危机。

《南风窗》：具体来说，从哪些方面实现突破呢？

黄靖：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定义是程序决定民主，这是政治学的基本理念，所谓“控制程序者是独裁”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制度的要义是妥协制度化。在法制的保证下，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程序的权利。

目前世界上起码有五种类型的成熟的民主制度——美、英、法/德、日以及西北欧各国。所有这些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本点，就是政治程序的高度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体来说，是在三个关键政治领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

第一是权力制度化。即权力的非人格化，权力由职位而设定，而不是因人而定。最高权力属于宪法。权力的合法性，是由制度来界定的。第二是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固定的“游戏规则”也必然导致所谓“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机制的产生和巩固。第三是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这是实现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步。

中国在权力制度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领导人一旦退休，其权力也随之移交。这都是权力制度化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制度上最实质性的进步。而中国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刚刚开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方面，中国则非常薄弱，人民的声音依然处于一种无序的表达，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要么不得其门而入，要么引发激进的行动。

目前来看，一味压制只能造成更大规模的对抗。与其筑坝，不如开渠。发展并加强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尤其是政策制定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向民主制度和平转型的必要保证。

走出“鸟笼悖论”

《南风窗》：那您如何评价 2003 年以来中国在改进分配政治方面的努力？

黄靖：实事求是来讲，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公平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因此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分配的公平。政治学上有一个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政治要求，因此，收入差距过大的群体之间，政治要求绝对有天壤之别。分配差距过大，很难保持政治稳定。和谐社会观点的提出，使得社会对民生问题越发重视。而科学发展观则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经济结构平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的投资等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坦率而言，这两个观点虽然点出了中国发展问题所在，但要取得更好的实施效果需要进一步努力。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已经被许多强势团体所挟持。其结果，所谓的国家干预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公正性也大受影响。

我认为，中国在政治层面面临两大矛盾：

一个是垄断经营与和谐社会的矛盾。既得利益群体、垄断行业对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两个观点有根本的抵触，这是因为有关政策损害了他们的根本利益。而对执政党来说，对主干产业的控制又不能放弃，这是一个僵局。

另一个是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搞活经济、促进发展最重要的是分权，简单而言是分权让利：经济决定权应赋予各级产业经理，而非国家官员——这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改革开放 30 年，就是经济分权让利的 30 年，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都因此获得很大的经济权力，从而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中国政府为了保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却必须集权。经济发展要分权，政策制定和实施要集权，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下，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根本矛盾。

其结果之一，是普遍存在的政策扭曲现象。由于各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可能各个地区得到一致认可和支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土政策”泛滥成灾。这是中国政策目前比较混乱的根本原因。

《南风窗》：这两个挑战无疑是巨大的。怎么解决呢？

黄靖：对于执政党来说，有两个历史教训是值得参考的。一个是，中国历朝历代，王朝垮台的根本原因往往并不在于外在威胁和内在的虚弱，而是朝廷管不住自己的官员。例如，明朝的典章制度应该是最完善、最严格的，但明末对官员的控制却日趋式微，最后皇帝不得不依靠东厂和锦衣卫对官员采取监控与震慑作用——尽管有效，但却加剧了各级官员和朝廷的离心离德。

另一个来自前苏联。其垮台之前，各国学者们认为最想脱离苏联的是中亚的各加盟共和国，因为他们与俄罗斯的种族、历史、文化、宗教渊源最浅。但导致苏联解体的，反而是欧洲的各加盟共和国，尽管它们的俄化程度最深，也是苏联经济政策最大的得益者。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对中央政策最抵触的往往是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

所以，我认为，现在领导人的纲领性政策非常有远见，重点就是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我把它归结为一种“鸟笼悖论”。现在的政治体制犹如一个鸟笼，纵向的结构非常好，捉住上端的提手，整个鸟笼便在掌控之中。所谓纲举目张，稳定性很好。但存在两个缺点。第一，横向结构很差，稳定性只建立在纵向结构。第二，鸟笼创造了空间，却解决不了空间的局限性问题。

这个悖论有两层含义。第一，过去 30 年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产生出很多能飞的鸟，成为活跃的市场经济主体。它们需要自由飞翔的空间，要突破鸟笼。但是，如果没有鸟笼，

不但目前的政权会失去对经济的掌控，而且整个体制也可能垮掉。第二，鸟笼的横向联系性很差，即政策的横向协调很难。

我认为，革命的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它能砸烂鸟笼。最终要解决这个悖论而又保持持续发展和稳定，还是要从上面谈到的“制度化”入手，从而使中国从改良和渐进的方向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叶蕴 《南风窗》2009-10-01）